

分工与专业化：马克思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一个视角

周绍东*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反思主要体现在重新将分工引入研究视野，而社会分工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社会分工在生产力层次或生产关系层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像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那样将社会分工看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纽带和中介环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从生产的物质和技术方面考察分工，更把社会分工看做一种制度关系，从而取得了相对于西方经济学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社会分工理论 比较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理论上的静态一般均衡范式在众多非均衡和动态演化现象面前越发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上新古典经济学指导下的拉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济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新兴经济学理论蓬勃发展起来，其具有代表性的有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理论学派，一方面是通过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硬核，并期望以此来回应各个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社会分工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强大包容力的体系框架。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理论进行比较，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分工理论的内涵，提炼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

一、新增长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比较

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中，稳态经济增长率将达到一个均衡水平，而决定这个均衡水平的是外生的居民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然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增长率趋同现象并没有发生。正是受到这些现实问题的盘诘和责问，Romer (1986, 1990) 考察了社会分工深化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其内生增长模型中，社会分工深化被数量化为生产中间品厂商种类的增加，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增长理论将社会分工水平与知识积累联系起来，把产品种类增长（包含中间产品种类）看做社会知识水平提高的标志和度量尺度，成功地将知识这一变量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使得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索洛余值”。新增长理论的另一条线

* 周绍东，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qiaoqingmu@tom.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7BJL007）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开放条件下中国区域间产业关联、增长差异与协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8BJL033）的阶段性成果。

索是由舒尔茨(1986)、Lucas(1988)开创的人力资本推动说,也即技术进步必须得到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积极配合才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实际上,人力资本积累与分工深化是互相兼容的,教育和培训活动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些领域中的分工深化,才大大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分工所带来的益处不仅仅是与物质资本有关的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人类专门化知识的积累,而这种专门化知识是以人本身作为载体而表现出它的资本性质的。

社会分工的深化充当了人类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桥梁,社会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生产函数中“知识积累”这一因素明晰地表现出来。并且,由于引入了分工深化和技术创新等概念,新增长理论才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奇迹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现象。可以说,新增长理论正是利用“分工”这一范畴,才成功地构建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革命。

与新增长理论相比,马克思经济学对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考察,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首先,无论是从社会分工还是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来看,分工对劳动生产率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分析了社会分工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指出了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内部分工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作用。尽管生产组织内部分工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奴隶制工场和各国统治者组织的协作劳动项目中,但它们是偶然的、外在的、单一的,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都是个别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分工,不论是否有商品交换,是极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生产组织内部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与新增长理论着重于考察社会分工深化和产品创新的分析思路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打开了企业“黑箱”,从产品内分工和工艺流程分工层面剖析了企业内部分工深化对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积极意义。其次,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注意到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广度和深度都与人力资本积累紧密相关,同时也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分析,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将分工深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这两条线索融合到了一起。另外,马克思通过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同作用的分析,认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类自身。他还指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绝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节约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使用比以前更少的时间来从事必要劳动,从而有可能从事各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活动,使人自身获得全面的发展。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又对生产率提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将这个人本身看成一种“固定资本”。当然,这种互动机制的形成,要求将人们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形成多样化的劳动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劳动者素质提高(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机制,而这正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

二、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比较

20世纪70年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额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额的事实,新经济地理学指出,国家之间并非一定要具有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特点,只要该国由于历史的或偶然的原因,形成了自然分工方面的优势,就可能通过报酬递增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一

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组织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焦斌龙:《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载《当代经济研究》,199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王建民:《劳动力商品与人力资本》,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席之地。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了产业空间集群和地理集聚现象,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运输成本、不完全竞争以及由分工协作导致的报酬递增共同组成了产业集群和集聚的决定性因素。在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地区,制造业为何会在一些发达地区集中而不在相对不发达地区集中?这主要依赖于在促使产业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削减产业地理集中的离心力两者之中,谁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分工和企业间分工的深入发展,产业集聚能够有效地促成企业产品平均成本的下降,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的企业产品相比,产业集聚区内的产品价格优势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强大向心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为分工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条件,分工导致的供给扩张推动了需求扩张,这又反过来加速了分工的深化,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分工决定分工”的“杨格定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分工深化还能够有效抵消由于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不可流动性而引致的产业离心力。物价指数的下降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吸引产业集聚区以外的技术工人流入本地;此外,企业自身通过外包、供应链协调、战略联盟等组织形式,通过产业链纵向分工并集中于核心业务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的窘境。所有这些,都为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在世界市场这一层面上构成了国际分工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强调国际分工的自然属性,同样也强调国际分工的社会属性,这尤其表现在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结果的观点上,也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是国际分工发育程度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分工所实现的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化大生产把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纳入一种新的分工和交换体系之中,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整个国际社会劳动分工的范围,发展了社会劳动种类,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马克思经济学并不否认自然条件、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交通通信手段以及各种历史偶然事件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但是,自然条件并不是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它至多是提供了国际分工的可能性。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时,自然条件才成为影响国际分工的现实因素。真正推动和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内在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因此指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而并非单纯地取决于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生产力因素。

不过,马克思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质疑。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影响国际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资本扩张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水平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资本运动不是特意选择某种专业化类型,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各国利润率差异不是决定于所谓的资源禀赋差异,而是决定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率,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所以说,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掩盖了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对分工的研究是与“交易费用”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交易无摩擦、企业生产是一个投入产出“黑箱”的假设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将分析的视角转移到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上来,将生产领域的分工问题与交易领域的交易费用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以科斯为代表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与市场存在着替代关系,企业的边界存在于进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导致的交易费用上升两力相抵的均衡之处。与科斯从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交易收益和成本权衡的利弊得失来解释企业性质不同的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94)更侧重于从企业内部分工的剩余分配和劳动激励方面阐述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企业的团队生产中,产品都是由团队成员分工协作生产出来的,由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每一个成员或每一种生产要素的贡献都不可能地被廉价地观察和精确地分解,因此无法做到报酬支付与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相一致。这种贡献与收益的不对称很容易滋生团队成员的偷懒和“搭便车”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要对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进行监督,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合作成员之间达成协议,由某个人专门从事监督工作,并且为了保证监督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必须将企业剩余索取权交给监督者。团队生产理论认为,这个监督者就是企业家,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便是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合作的收益难以在劳动者之间公平分配,为了杜绝道德风险的产生,必须要由企业家对生产和劳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

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分工理论对企业的认识,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框架。如果我们将企业内部分工、企业间分工、部门间分工等概念进行整合,可以将劳动分工分为宏观分工和微观分工两大类。所谓宏观分工是指部门或行业分工,它的结果是形成众多的劳动部门;所谓微观分工是指同一生产组织(例如一个工厂)内部不同操作环节之间的划分,其结果是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动集体或生产团队。微观分工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后才成为一种重要分工形式的,企业内部分工的产生,或者说企业的产生,不仅仅是交易费用使用使然,更重要的是资本组织劳动分工的结果。马克思曾就此指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一种商品,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企业内部分工以劳动对资本的绝对服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权威为组织基础,真正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企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逐渐产生、壮大,而不可能在自然经济社会出现。

当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因此,它仍然在社会分工层面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相似性。西方经济学沿着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提出社会分工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组织性和计划性,也就是说,市场交换主体可以通过对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了解调节自身的生产活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可以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交易活动,从而使各主体的分工协作具有完全的组织性和计划性。针对这一“市场万能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 Williamson(1985)指出,在市场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分工制度安排,利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三个概念,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交易的属性不同,相应的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和权能也不同,因此形成了交易与治理结构的不同匹配,绝非只有自由市场体制这一种选择。

马克思经济学并不否定市场交易和价格信号对社会分工的调节作用,但是,社会分工的无组织状况不可能完全通过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而自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社会化的途径之一是企业内部分工对社会分工的替代,是利用企业内部分工的组织性来替代社会分工的无组织性。但是,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替代也是有限的,当企业规模扩大到某一限度时,内部管理矛盾层出不穷,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学深刻地指出:“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同工场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分工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分工是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的,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就蕴含着这样的推论:单纯的以自由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宏观分工,或者是单纯的以科层控制为基础的微观分工都不能独立地成为社会分工的现实存在形式,两种分工之间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补充关系,它们在时空上并存融合,并行不悖,共同演进。

四、新产业组织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比较

新产业组织理论同样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它打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框架,对哈佛学派仅仅从市场结构上来推测企业行为的单向、静态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在新产业组织理论看来,市场结构不是简单地外生地给定的,企业策略性行为改变了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使其适应性地调整自身行为。因此,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联合内生关系。

有趣的是,针对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最早也是基于分工问题而产生的。早在 1951 年,乔治·斯蒂格勒就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与市场中竞争程度成反向关系,无论是纵向的产业间分工,还是产业内横向分工的深化,都有可能导致市场结构向垄断方向发展,而这根源于市场容量和最小最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 1 卷,35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7 卷,356~35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优生产规模(Minimum Scale of Efficiency)两个方面。如果市场容量已定,最小最优生产规模标准的提高会强化市场中的垄断程度。因此,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提高行业进入门槛从而获得市场势力。另外,专业化的经营决策还会导致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容量缩小,实际上,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的策略就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消费领域,生产差异化产品以避免与其他同类企业的竞争。分工和专业化通过增大最小最优生产规模和缩小目标市场容量两种途径,为企业的垄断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新产业组织理论是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市场结构变动和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联系纽带的。

实际上,早在写作《资本论》的时代,马克思基于产业间和企业间分工的视角,就已经发现并分析了当时英国企业进行前向和后向一体化,以及存在于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的好处。马克思以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坩锅为例说明了“前向一体化”。他指出:“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锅,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锅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在有关纵向一体化的现代理论中,保证原料和生产资料质量是企业进行前向一体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还以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同磨玻璃业、铸铜业的结合为例,说明了“后向一体化”。“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做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与新产业组织理论强调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可兼容性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产品和劳动力联系的方式不同。社会分工体系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产品联系是商品交换,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不同使用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而企业内部分工中的不同使用价值,由上级部门用行政方法进行调拨,所以产品不成为商品;劳动力也分属于各个单位,通过产品的交换发生关系。而在一个企业内部,劳动力一旦被出售给一个资本,这个资本就把劳动力作为联合起来的“总体”劳动力来使用。其次,分工的规划方法和调节机制不同。在社会分工体系里,分工是通过市场调节生产资料配置来实现的,价格机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生产组织内部,生产要素的比例调节是用行政方式实行的。再次,分工主体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分工体系里,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而在经济单位内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以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权威为前提的。从分配关系来看,社会分工中的生产者对产品具有支配权,而企业内部分工中的生产者对产品没有支配权。

五、新兴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黄有光、博兰等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树立起分工经济学的旗帜,试图从内生演化角度阐述社会分工产生和深化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分工如同自然界事物发展一样,是一个自动演化的过程,分工的深化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分工又会导致交易费用。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极低的生产率使人们无力支付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劳动者慢慢地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逐渐地有所提高,使其能够负担得起一定的交易费用,于是人们开始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随之出现。而提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又加速了物质产品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每个经济主体在权衡专业化带来的报酬和当前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这一行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正是这种动态机制使得社会分工自发演进。

由此不难发现,新兴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为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否定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尤其是反对将既定分工格局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看做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正如杨小凯所指出的,由于缺乏合适的数学工具,以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基础的西方微观经济学无法处理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济主体进行分工选择时所面对的角点解问题,因此,只能将其简化为在既定分工格局下的内点解问题,这就形成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微观经济学为“资源配置”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是严重脱离事实的:社会被硬生生地分割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大群体,每个消费者的购买清单中包括所有商品,因为内点解决定了只有当所有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的比值相等时,消费者才能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就在一处注释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这其中的“拟制”一词,是指把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当做存在的事实来处理,马克思这一贴切的用语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提法及其解决方法的荒谬。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问题在理论基础上的薄弱,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着手弥补这一缺陷。通过运用非线性规划中的“库恩-塔克”方法和文定理等数学工具,杨小凯等人排除了分工选择中不可能最优的某些角点解,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计算了剩余角点解的最优值,从而解出了社会最优的分工水平和给定分工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于分工的分析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反映,只不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化工具转移了我们对其意识形态立场的注意力,而更加关注分析的技术细节。

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将分工上升到“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这一层次,关键在于:分工形成了人们的劳动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财产关系,进而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因此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尽管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存在譬如种姓氏族或行业协会等强制性的分工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决定了无产阶级无论是在社会分工还是在工场内部分工中都不能进行自由选择。首先,“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工人享有绝对的权威……(资本家)高声责骂对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觉的‘独创性’。”其次,无产阶级在决定自身参与社会分工的选择过程中也并非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自由”,因为“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与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自身的出卖者。”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失地农民丧失了所有生存保障,只能成为雇佣工人,他们的分工自由只存在于受雇于哪一家工厂,从事哪一类工种工作这样的范围内,而绝不可能是选择成为自主的生产者。换句话说,工人所面临的“角点解”绝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设想的那样丰富,他们的分工决策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丧失自由的自由。

如果说新兴古典经济学看到了分工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分工和专业化的兴趣,那么,它也只是帮助我们对分工这个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加深了认识,并没有像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那样,不仅探讨了分工作为一般劳动形式的角色,“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特殊劳动形式层次上的分析,并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时也是有计划、有调节的分工代替无计划的、盲目的社会分工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获得全面发展,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个性自由并最终“消灭”分工的过程。

六、总结

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探讨是从劳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的,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5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412~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10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劳动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作为内容,是指人们干什么,作为形式,是指人们怎样进行劳动,而分工就是劳动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时,并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劳动要素本身革新和发展的范围内,而是把这种革新和发展与劳动者的活动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另外,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运用生产资料从事劳动活动时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要依靠特定的劳动方式将各种劳动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劳动方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整体体现,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特殊性质,撇开劳动方式来谈生产力,将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缺乏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方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分工的发展上,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任何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离开了分工这个人类的基本劳动方式的发展,就无法说明各种生产关系是如何通过生产的物质技术手段方面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

本文上述几种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在不同层面上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和专业化分析思路。新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将时间和动态因素引入了分工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空间分布问题,地理和区位上的产业分工、企业分工和产品分工正是经济集聚的根本原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产业组织理论都以分工的成本和收益为主要线索,考察了企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组织演进的复杂互动关系;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而言,正是由于重新引入了社会分工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框架才能够摆脱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割裂,使西方经济学具备了重新回归到宏微观一体化的轨道上来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理论仅仅孤立地研究社会分工在生产力层次或生产关系层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像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那样将社会分工看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纽带和中介环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从生产的物质和技术方面考察分工,更把社会分工看做一种制度关系,从而取得了相对于西方经济学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参考文献:

1. 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见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文版,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6。
10.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Becker, G. and Murphy, K. ,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pp. 1137 - 1160.
12.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pp. 483 - 499.
13.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pp. 3 - 42.
14.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 Run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pp. 1002 - 1037.
15.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pp. 71 - 102.
16. Williamson, O.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责任编辑:彭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